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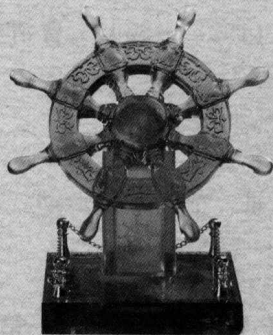
曹清华 著

ZHONGGUO ZUOYI WENXUE SHIGAO

中国左翼文学史稿

(1921—19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曹清华 著

ZHONGGUO ZUOYI WENXUE SHIGAO

中国左翼文学史稿

(1921—19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左翼文学史稿 (1921—1936) / 曹清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004-6918-6

I. 中… II. 曹… III. 左翼文化运动—文学史—1921—1936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2975 号

选题策划 黄燕生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曲 宁
封面设计 大鵬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黄子平

何谓“左翼文学”？

依照目前的文学史论述，通常有如下四种给“左翼文学”下定义的途径：

首先，众所周知：“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左、中、右。”套用这种全称判断，只需将句式中的“人群”置换为“文学”，“左翼文学”就得以界定。作家的阶级政治身份连带他们的作品，因之而呈现一种政治光谱分布。但老黑格尔早就指出了全称判断的狡计，即是用某种享有特权的特殊判断冒充普遍性。这里则是遮掩了那个划分“左中右”的主体立场，遮掩了“左中右”是划分的产物而不是划分的依据。暴露这一全称判断狡计的最极端例子，当然是那些个在所有单位统一按比例揪斗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了。现代文学史的不断“重写”，作家的湮没与“归来”，正是这一特殊划分（揪斗与统战）变动不居的体现。

其次，沿袭《新民主主义论》的进化论叙述，“从（五四）文学革命到（30年代）革命文学”，然后40年代“延安文艺”，50到70年代，“共和国文学”，一路走来，浩浩荡荡。进化论叙述不但提早将五四新文学置于尚未成立的左翼政党领导之下，而

且刻意淡化了“革命文学”对五四的诋毁与清算，泯恩仇于一笑，化曲折为坦途。90年代以来的这种论述带有浓郁的“怀旧”意味，其实是一种“消失的消失”，即对一种从来就没有存在之物的怀旧，或者说，这种“左翼文学”论述是怀旧的产物，经由詹明信所说的“对当下的怀旧”而产生。

再次，第三种论述与进化论叙述立场相左，而思路相同。它把“左翼文学”统归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系统（“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依照某种不证自明的“纯文学”标准，针锋相对，把进化论讲成了步步萎缩的退化论。不但鲁迅加入“左联”之后创作力消退（有《故事新编》的后半部为证），而且40年代之后就只剩下沪港才女张爱玲，一枝独秀，赵树理们当然更是不在话下。这种论述同样热衷于为作家排座次，其依据却是类乎当今“排行榜”一流的消费文化逻辑，遂有金庸取代茅盾一跃坐上第四把交椅的头条新闻出现。

最后这种论述最为有趣，即希望从复杂的文学史中过滤出一条“面目可亲”的“左翼”线索，比如说，从鲁迅到冯雪峰再到胡风，由受害者好人们贯穿而成。于是“延安文艺”就不但不是“左翼文学”的发展壮大，以王实味、丁玲等“真正的左翼作家”被整肃为标记，“左翼文学”的消解于焉开始（“统治者的文学不可能是左翼文学”）。文学史叙述者的善良与叙述对象的善良在这种好心肠的论述中融为一体。表面看来，这种论述中的“左翼文学”有始有终，有形成有消解，最为“历史化”，但“好的故事”带来的“超历史”抽象普遍性更为严重。“好人”的系谱学往前延伸，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穷人》和托尔斯泰伯爵的《复活》也被说成了“左翼文学”的先声；向后延伸，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当然是90年代以来的“打工仔文学”或“底层文学”了。历来被左翼政治痛斥为“廉价人道主义”的作品群，反讽地构成了左

翼文学的发展主线。

显然，曹清华的论述迥异于上述种种思路。

“左翼文学”不是不证自明的历史实体，而是发生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空间中的一个“话语事件”。特定的历史时空，被严格限定在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存在的年代及前后。曹清华认为，这一话语事件由两个层面的历史活动相辅相成地建构起来：首先，是一系列“关键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阐释向中国文学的引入；其次，上海的文化出版市场，以及由此构成的容纳左翼作家与左翼读者的“公共空间”。先说这第一个层面：关键词。

鲁迅曾经尖锐指出，“新潮之进中国”，新名词每被敌对双方均视为具有“咒语”般的功能，但“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①。其实新名词尤其是关键词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远远超出其抽象的概念意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经济学词语，在郭沫若的《女神》中转换为一种“无私”的道德形象（“炉中煤”、“春蚕”等）。到了《创造季刊》时期，提出要在文学运动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来对抗“资本主义的毒龙”。^② 这里依然是道德价值的对比，而不是经济关系的揭示。曹清华引人入胜地仔细梳理了这一转换过程，指出作为道德形象的“无产阶级”如何能够平顺地“消化”早期创造社的文学主张，譬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核心概念“苦闷”：“个人的苦闷”怎样通向“社会的苦闷”和“人类的苦闷”，因而

① 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鲁迅全集（16）》，第291页。

②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5页。

与世界革命的目标一致。过滤了经济关系的重要内涵，这些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才能“从破坏到创造”，只需去“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就能凤凰涅槃一般在话语的火焰中死而重生。用鲁迅的话来表述，就是“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① 曹清华认为，这种自我认同，正是知识人“左翼文化身份”的历史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中，（产业）工人阶级是一种实存，无产阶级则是一种应然的想象；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马克思已经逐渐放弃了无产阶级是一种“普遍阶级”的观点。郁达夫曾以“曰归”的笔名，在《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6期，刊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一文，批评有人抄袭外国思想，大喊“无产阶级文学”。他指出若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实现，无产阶级文学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② 鲁迅用这样朴素的比喻，来界定无产阶级文学的（不）可能性，表明他与郁达夫一样，未能参透关键词之语义转换中的历史奥秘。在产业工人占人口比例甚低的第三世界，上述语义转换提供了由农民为主力来进行共产革命的知识条件。让水管流出血来，正可看作后来左翼政治和文学写作最艰苦卓绝的努力。

倘说“无产阶级”的重点在于认同，而“革命文学”的重点则在于排他；当然，认同从来都是由排他而构成。也就是说，“革命文学”的建构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清算为基础。“趣味文学”、“新八股”、“贵族文学”，当年五四先驱严厉发布的古典

^① 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4）》，第136页。

^②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3）》，第544页。

文学的这些罪名，如今反讽地一一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封建余孽”、“老头子”鲁迅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清算的头号目标。“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邨），“时代是革命的，我们是从事文学工作的”（郭沫若），我们和他们，生与死，划分的依据是“时代”。“无产阶级”侧重于社会空间的划分，“革命文学”强调历史时间的嬗替。如此与时并进永不言休，“左翼文学”也就无可避免地陷入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历史宿命。

这就说到了话语事件的第二个层面：出版。

“左翼文学”与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被历来的文学史家完全忽略了。曹清华基于大量的史料讨论了泰东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等与左翼出版物的关联和纠葛，精彩地揭示了左翼写作在政府如此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仍顽强生存并获得大量读者的历史现象。譬如光华书局的老板张静庐十几年后回忆《洪水》的创刊：“洪水，这有特殊风味的刊物（创造社同人除文艺作品外，从来没有做过政治论文的），在读者们迫切需要下，在一家陌生的书店里出现了，很快的被各地同业所重视，向来没有交往过，也没有先铺一层‘账底’，居然有很好的成绩。货款也有很多是先期进来的。”^① 出版市场与左翼写作的关系密切到这样的程度，不但商业性文学刊物如《文学》《现代》以左翼作家为支柱，连国民党政府办的刊物也不排斥左翼文人的来稿。最典型的例子汪系《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特邀请左翼作家聂绀弩为主编。这一副刊除了鲁迅的文章经常露面，宋之的、田间、周而复、艾青、张庚、欧阳山等也成为支撑

^①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14页。

版面的重要作者。^① 曹清华指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与繁荣仰仗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中自由运作的出版市场。左翼文学是一个文化和出版市场的产物，它通过上海的出版物所构筑的公共空间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流通。

与此同时，左翼文学作为一个依赖于出版市场的文化现象，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拥有相当的读者。左翼文学令读者感兴趣以及左翼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则仰仗左翼文学为读者建构的一个关于历史和道德的知识系统和想象方式。这一知识系统和想象方式在左翼写作中归结为“吾谁与归？”与“吾谁与共？”两个问题方式，前者涉及对未来历史的想象，后者则关乎个人道德位置的选择。“无产阶级”、“大众”等关键词使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成为可能。凭借这一知识系统和想象方式，一方面左翼作家在写作中展现、复述其左翼文化身份，并寄托其历史道德理想和想象于其上；另一方面，读者经由阅读加入到这一身份的集体想象和建构当中。正因为左翼文学所构筑的文化空间里面，作者与读者共同享有这一文化身份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知识系统，左翼文学才获得了广泛的读者，才可能突破国民党政府的层层障碍在上海出版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经由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曹清华对“左翼文学”生产机制的回溯并未到此为止。“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运作和无声无息地解散的过程，才是他探索上述“左翼文化身份”的重头戏。细读“左联”的理论纲领，他发现，这一身份在当时就建立在“无产阶级”一词摇摆不定的所指之上——一方面“无产阶级”被描绘成社会历史的主体，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符号，属于

① 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及〈海燕〉停刊等》，《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第216页。

知识分子仰望的对象，在这一道德形象的逼视之下，左翼知识分子立即因原罪而失语无言；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对应社会现实中默默无声的一群，他们在社会文化的暗处，远离语言文字，承受着知识分子对苦难和压迫的想象，依赖于知识分子去表达、描述并建构出历史意义。这个闪烁不定的词语正预示了左翼知识分子在往后的文学和文化事业中的艰难处境。

这一身份悖论直接体现在左翼叙事之中。出走的故事、漂泊的故事、死亡的故事、孤儿与杀父之仇的故事，把人物从五四意义上的“家”/“家族”故事中解放出来，并以崭新的故事情节，别样的话语机制，为人物及其社会关系建构新的意义。同时，在左翼小说的苦难叙事中，苦难承受者的形象给人模糊、重叠、漂移不定的印象。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苦难故事的主角不是向读者不断地展现其“不幸”的个人特征，而是主人公逐渐被替换，被抽空为一个词语一组数字，最终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和知识。左翼小说的苦难叙事大多时候离开了肉体、个人，离开了具体的历史位置，以巴特所谓“同义反复”的修辞手段而依附于抽象的词语和想象之上。这也是左翼小说中充斥着“演说”、“谈话”、“独白”、“民谣”和“合唱”的重要原因。

叙述者以底层身份出场，却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身份与语言能力的裂痕充分揭示了左翼叙事的最大难题。依照阳翰笙在《地泉·序》中的检讨，左翼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似“飞将军自天而降”的人物，他们被赋予社会下层身份，却掌握了“革命知识/理论”而且具备话语/知识的表达能力，“于是乎演说，于是乎开会，于是乎革命，于是乎成功”。五四文学中那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叙述者，那个自我怀疑“不能画出沉默的魂灵”的孤独者，淡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平线。

这就是所谓“左翼鲁迅”的复杂与悲哀了。鲁迅体认“惟新

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但立即界定自己为“中产的智识阶级”，也就是将消失在未来的黄金世界里的“影”。他一面加入“左联”，“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①。一面又视“左联”中人多半为“茄花色”，甚至是“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只有口号而没有实绩。落实到写作，鲁迅的回答是既切实又无力的：“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②这里所说“不必趋时”表达了鲁迅对那些喧嚣、激烈而又僵硬的修辞、叙事以及它们所虚构的“时间”的拒斥，而“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则无异于呼吁作家回到个体的时间和故事以树立个人写作的基本信心。但是谁又能忘记鲁迅那不在实际斗争的中心故不能写作的自叹呢？

曹清华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和充实，终于可以印刷成书了。回想起那些师生与话语互相折磨的日子，我为他感到高兴，并写了这小序为贺。

2008年1月

① 鲁迅：《310204 致李秉中》，《鲁迅全集（12）》，第37页。

②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4）》，第369页。

目 录

序	黄子平(1)
引言 词语、想象与身份	(1)
第一章 左联成立以前	(8)
第一节 对“无产阶级”的最初知识和想象	(8)
第二节 “革命文学”的命名	(26)
第三节 “革命文学”论争的发起	(41)
第四节 文坛对“革命文学”的回应	(59)
第二章 左联与左翼身份	(81)
第一节 左联成立与身份建构	(81)
第二节 组织框架中的身份运作	(107)
第三章 三次论争与身份诉求	(131)
第一节 左翼作家的另一个活动空间	(131)
第二节 身份想象与大众化的难题	(141)
第三节 “真理”/“真实”背后的话语机制	(159)
第四节 左翼身份的坚持	(167)

第四章 左翼叙事·····	(174)
第一节 左翼小说生产·····	(174)
第二节 情节:死亡与反抗 ·····	(186)
第三节 苦难的想象与写作·····	(207)
第四节 革命与性·····	(217)
第五节 身份难题·····	(233)
第五章 左翼鲁迅·····	(245)
第一节 革命、“革命”与革命人 ·····	(245)
第二节 大众、表达与“无产阶级” ·····	(263)
第三节 左翼文学:想象的与现实的 ·····	(276)
参考书目·····	(288)
后记·····	(316)

引言 词语、想象与身份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或有关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我们常常遇到“左翼文学”、“左翼作家”、“左翼叙事传统”、“左翼文学思潮”一类的称谓。似乎历史上有一个清晰而客观的文学现象为人们认可、掌握，以至不约而同地名之曰“中国左翼文学”。与诸如“中国现代文学”、“欧洲文学”、“20 世纪美国文学”等用时间和地域名词限定的名称不同，“左翼文学”的限定词是一个表方位的名词。这一“左”的方位选择指的是政治？文化？还是别的？“中国左翼文学”到底指什么？

与“中国左翼文学”这一名词在意义上联系最直接最贴切的是文学社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称“左联”）。自 1930 年 3 月 2 日在上海成立，到 1936 年解散特别是鲁迅先生逝世，左联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文学团体。

作为一个社团，左联拥有自己的物质载体——发起人名单、成立大会、理论及行动纲领、领导机制、机关刊物等，亦通过举行会议、颁布决议、更换领导成员、吸收和开除盟员、发行内部刊物以及组织集体的政治文化活动，维持团体组织的历史延续。

然而，左联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联合体，不少加入左联组织的青年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并不从事写作活动，左联的集体行动亦太多与文学无关。“左翼作家”这一身份被左联派上扩大组织和开展政治活动的用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其修饰词“左翼”是一个“政治”表达。

与此同时，左联不像一个政治组织那样对所有的成员拥有相当的约束力。不少加入左联的作家以文谋生，他们在左联成立之前和以后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作品，创办刊物编辑丛书，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不受左联组织掌控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面，左翼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社会文化批评，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左翼文学——一个文化现象的存在。

鲁迅自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到1936年逝世，一直与左联组织和左翼文学活动联系在一起。鲁迅的写作以及他与左翼群体的关系，甚至他的名字本身所拥有的符指功能也构成了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研究视野中的“中国左翼文学”大体上指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

二

从1939年李何林先生出版《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开始，学术界已有不少专门或侧重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著作面世。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类。

其一，剖析左翼文学与政治的关系。1949年以后，国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或其他左翼文学的专门著作，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国家在文化领域建构其知识/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这一特定的政治视角思考和叙述文学的历史。左翼文学被择取、切割、编织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政治斗争史相呼

应、合作的文学运动。^①而且这一思考方式影响到一些当事人对“左联”历史的“回忆”，以至构筑左翼文学与政治历史之间的意义关联，成为左翼文学论述与左联回忆录的共同特征。

尽管所处政治环境不同，甚至形成截然相反的结论，台湾地区以及海外的中国左翼文学研究者同样流于这一研究角度。^②夏济安(Tsi-an Hsia)写于美国的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可谓一本代表作。仅看此书的章节安排，你就会发现，他选取的“左翼作家”不少是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纷争中的敏感人物，全书的焦点亦在政治选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政治和学术气候的变化，一度引起研究界对左翼文学重新叙述的兴趣。左翼作品在一般学者眼中，成为政治干涉文学使其背离“文学本身”的文学史范例。⁹⁰

① 举一个“切割”的例子。唐弢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段这样的论述：“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其中所引鲁迅的原话就是从下面一段话中“切割”而来：“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这“切割”而来的句子要表达的意思与原文的意见截然相反。——以上引文分别出自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 2 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 82 页；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 236 页。注：以后凡引《鲁迅全集》均出自这一版本，书名号内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指的是全集的卷数。

② 我国台湾地区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左联的专著。比如，陈敬之：《三十年代文坛与左翼作家联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周行之：《鲁迅与“左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代以后，海内外研究界看取中国左翼文学所受政治立场的束缚开始松动，左翼文学研究过去表现出的政治表达/批判的锋芒逐渐收敛，研究者视野更加开阔。香港学者王宏志从左翼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入手，描述左联作为一个组织的历史进程的专著：*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无疑是一部较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的力作。

其二，探索左翼文学思潮所受的外国影响。其中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堪称代表作。近年仍有研究者致力于这一方面的讨论，旷新年的专著《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有关左翼文学的章节亦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三

半个多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历史中，大多研究者没有重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赖以生存的文化和出版的大背景。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与繁荣仰仗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中自由运作的出版市场。左翼文学是一个文化和出版市场的产物，它通过上海的出版物所构筑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流通。尽管左联的成立和运行与中共的政治网络不无关联，但是左联组织与政党政治之间尚有距离，而左翼文学更是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中维持它的存在。^① 本

① 王富仁视左翼文学为社会文化亦是一个富于启发性的观点。见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第25页。